

简论邹韬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

——兼与穆欣同志商榷

陈 挥

今年七月二十四日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邹韬奋逝世四十三周年。韬奋很早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中，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这个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穆欣同志认为，在一九三三年，韬奋出国流亡以前，他还未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还没有完全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直到一九三五年，他返回祖国的时候，才完成了这个转变，其主要理由就是他在出国时还没有解决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①。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还值得商榷。众所周知，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他自己的发展过程和特殊经历。它既打有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又有他自己独特的色彩。有时虽然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了明确的认识，也未必一定会在论著中去论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在论述韬奋思想观点的变化时，就不应脱离他的思想发展的历程，脱离他的思想实际，而用一般性的原则和条文去衡量他。只有从他所已经论及的范畴中来评论，才是合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能离开实际去向他提出苛求。毫无疑问，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这是当时革命领袖和理论家们应该正确解决的问题，是衡量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的标准之一，又怎能拿来要求韬奋呢？

我认为，韬奋在思想上虽然转变得较迟，但在转变以后的进步却是惊人的快。他从“九一八”开始转变，到一九三三年七月出国以前，已经基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一九二七年韬奋为《生活周刊》规定的政治纲领是“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②，认为这是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所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他还认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有三件东西，一是统一，二是生产，三是国防”。这种政治主张虽然表现着对现实的一些不满，然而并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秩序根本对立，反而是倾向于不必根本改变这种统治秩序而使中国按照资

本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改良主义的幻想。

但是，自“九一八”以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韬奋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和过去比较，有了根本的差异。在“九·一八”以前，韬奋虽然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有多种不满和牢骚，但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还不过是要求统一，要求发展生产，要求加强国防，实际上表现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但经过“九·一八”以后，他的态度就有了变化，一九三二年七月，他在一篇言论中愤怒指责了国民党新军阀“对于民众所梦寐以求的对外抗敌”，“漠然无动于中”。他已经认识到因为军阀们“所最重的是个人的地盘权利”，因此，“民众为着自身利益而反抗军阀混战，反抗帝国主义的压榨，除非把政权和武力权放在民众手中，或放在确能为民众奋斗的集团手中，绝对没有其他便宜的道路走”。^③他还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杀害民主斗士杨杏佛，并说：“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在青年里所潜伏着的革命种子已有随处爆发的紧张形势，而当时统治者的横暴残酷，也处处催促革命狂潮的奔临”。“俄国革命便由统治者在这种压迫青年自掘坟墓中酝酿起来。”他还强调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只会“增加大众的愤怒和痛恨”。虽然这里字面上说的是俄国的沙皇，但矛头所向却是国民党政府。

第二，能够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九·一八”以前，韬奋对于阶级的观点是十分模糊的，他曾经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虐待职工不顾人道的惨酷的资本家”和“优待职工热心群众利益的实业家”，对前者表示痛恨，

① 穆欣，《邹韬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109、87页。

② 《韬奋的道路》第221页。

③ 《韬奋文集》第99页。

对后者表示赞同。^①“九·一八”以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事实教育了他，使他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深刻地指出：“现在社会的问题，讲得简单些，无非少数享特权的人和大多数被掠夺的人彼此间的斗争。在少数享特权的人死死地把持着他们的特权，惟恐不保，这是必然的。”^②而且，他们“必是不到黄河心不死，非挣扎到最后一口气是不肯放手的”。因此，他认为要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就必须具有不怕牺牲的决心，“因为民族的生命和历史是很长的，我们要放大眼光，倘不幸而不得不为长时期而牺牲短时期，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虽欲避免牺牲而无法避免，只得放手做去，不应以短视的态度，姑息养痍，贻无穷的祸患于将来。”^③即使遇到“挫折”和“困难”，“不但应引起颓废或悲观，反应增强努力的勇气，增进猛进的速率”。^④到他开始了第一次流亡生活以后，已经自觉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上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他充分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现象”^⑤。他说：“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⑥而且他认识到在这种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明确指出：“这个斗争不是由少数英雄对付若干个人的斗争，是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⑦在韬奋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阶级观点的日渐明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社会，才能抓住各种社会现象的阶级实质，认识阶级社会的特殊规律。在这一阶段，随着阶级观点的日益明晰，他对中国革命出路的认识，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才逐渐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从而得出了：“最伟大的莫过于大众的意志的力量”的结论^⑧。

第三，在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上，韬奋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他说：“决不可含有劝人甘愿伏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任其延续其生命，须使人彻底认识畸形社会之所以由来与革命的正确对象。”^⑨他尖锐地指出：“就压迫的力量而论，帝国主义者当然是首屈一指，要推它坐第一把交椅，因为它不但能用飞机大炮直接置殖民地的民众于死地，同时还能叱咤风云似的，颐指气使着殖民地的军阀官僚们镇压殖民地的民众，动辄可以把他们提

将宫里，带上极重的脚镣，冤沉海底，哭诉无门。”^⑩可见他已经看清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的勾结，帝国主义是军阀的后台、主子，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傀儡走狗，这就把当时的中国革命的对象完全认清了。这是韬奋在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都作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和我们党的革命纲领是完全吻合的，表明了韬奋在中国革命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已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韬奋不仅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而且对于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人民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摆脱这三座大山的统治这样一个关于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他明确指出：“革命事业的最后手段当然要靠枪杆。”^⑪

第四，对于苏联和社会主义运动，韬奋也有了初步了解。他很注意阅读中外出版的介绍苏联情况的书籍，对于当时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进行研究，并且介绍给中国人民。他在一九三四年给高尔基的信中说，办《生活周刊》的目的，“是在中国鼓吹社会主义，同情中国的苏维埃运动”。^⑫一九三一年，胡愈之从国外考察归来，写了一本《莫斯科印象记》出版。韬奋读了很高兴，写了一篇书评介绍，题为《读〈莫斯科印象记〉》，在《生活周刊》六卷四十期上发表。《生活周刊》从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开始，还系统地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宣传社会主义，介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从而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活跃阵地。一九三三年五月，韬奋还编译了一本长达二十万言的传记《革命文豪高尔基》，也是他思想进步的一个标志。在此以前，他也写过不少人物传记，但都是介绍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从崇拜资产阶级的大亨到歌颂无产阶级的英雄，这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韬奋尤其钦佩。他曾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大力赞赏“列宁对于党内信仰动摇的分子之坚决的不肯迁就不肯妥协的精神”，并深刻地指出：“理论彻底，策略正确，然后以排除万难坚定不移的勇气和精神向前干去，必有成功的一日，即最初同志甚少，这种坚如金硬

①②④ 《韬奋文集》第一卷。

③ 《生活周刊》第七卷第26期。

⑤⑥⑦⑧ 《韬奋文集》第二卷。

⑨⑩⑪ 《韬奋文集》第一卷。

⑫ 《论韬奋与高尔基》，《文艺报》1958年第3期。

如铁的同志，一个可抵十个百个，内在的力量是异常伟大的。”^①这里，韬奋不仅对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的力量以极高的评价，而且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第五，对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韬奋也逐渐有了认识。早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生活周刊》就发表了一篇《世界的趋势和中国的未来》，指出：“世界的大势已经很显明的正在一个转换时期，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由极盛时期而渐趋于衰落，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思想深入于一部分人之脑筋而有渐渐发芽滋长的趋势。”^②到一九三二年一月韬奋则进一步认识到，“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③同年七月，他在《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中特别强调剥削制度的存在就是中国和全世界的病根子，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因此，中国“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④。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韬奋已经基本上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本上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也是韬奋在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是韬奋世界观发生显著变化的阶段。“九·一八”以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韬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他的社会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日渐为唯物主义观点所代替，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韬奋对历

史发展的趋势，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都已经达到或十分接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度了。他这时所注目的是工农大众的彻底解放，他用以观察分析社会上各式各样意向的，主要是阶级的观点。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要经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这种质的飞跃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究竟“飞跃”何时出现，则决定于导致转折的具体条件。而杨杏佛被害前后尖锐剧烈，风云突变的阶级斗争形势，恰好为韬奋思想上的这种飞跃创造了现实的条件，使他完成了这一伟大的转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此，韬奋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坚定地站在革命立场上，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诚然，经过第一次的流亡生活以后，韬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更为成熟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他要到回国以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承认韬奋在出国前夕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意味着他无需前进和提高吗？当然不是。韬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只是一个伟大的新起点，只是为他日后成为一个成熟的运用自如的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道路。自此以后，他更加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改造世界观，逐渐锻炼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① 穆欣《邹韬奋》。

② 《生活周刊》第七卷，第1期。

③ 《生活周刊》第七卷第26期。

④ 同上。

